

陳子龍方以智的詩學論交與分趨

——以「雅」的觀念為討論中心

謝明陽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提 要

陳子龍(1608-1647)與方以智(1611-1671)為明末清初歷史舞臺上令人矚目的兩位奇才，二人不僅以文章著述冠絕於當代，更以崇高的氣節風範流芳於後世。崇禎五年(1632)，陳子龍與方以智因論「大雅」相合而定交，其後，方以智的詩歌觀念又因時代的動盪而發生轉變，此段詩學論交與分趨的歷程，一方面展現了陳子龍與方以智深刻的詩學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二人不同的人格精神，頗值得我們予以深究。本文將以「雅」的觀念作為討論中心，分成四小節探討此一議題：首節，先考述陳子龍與方以智論詩定交的經過，並分析二人「雅」的觀念所具有的意涵；第二節，以陳子龍對方以智的詩學引導為線索，呈現其將「詩歌」與「政治」合而為一的生命理想；第三節，考察方以智在與陳子龍交往的過程中，如何檢討雅正詩學，進而提出新的見解；最後，則透過陳子龍與方以智的思想分趨，論析二人寄寓於詩學論述中不同的人生抉擇。

關鍵詞：明末清初 詩學 陳子龍 方以智 雅

來稿日期：2005年9月28日，通過日期：2005年10月24日

陳子龍方以智的詩學論交與分趨

——以「雅」的觀念為討論中心[□]

謝明陽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陳子龍(1608-1647)，字臥子，江蘇華亭人。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安徽桐城人。陳、方二子分別為明清之際詩壇與思想界的巨擘，均以文章氣節炳耀後世。在清初學者的評論中，陳子龍每被視為晚明詩學復興的領袖人物，如錢价人(？-1662)《今詩粹》云：「大樽當榛蕪之餘，力闢正始，一時宗尚，遂致群才蔚起，多於弘、正之代，幾與盛唐比隆，推廓振興之功，斯為極矣。」[□]方以智則被許為博通古今的一代才人，如明遺民李世熊(1602-1686)為方以智次子方中通(1634-1698)《數度衍》題序云：「世所稱方桐城者，方密之先生也。生生合忠臣、孝子、才人而一矣。性命之學、三才物理之學、聲音文字之學，與夫一技一藝，莫不窮其源，造其極，誠古今第一奇男子，名甲天下。」[□]這些推崇之論，與當今學術界對陳子龍、方

-
- 本論文曾宣讀於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辦之「北京 2005' 中國古代文藝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 清·魏畊、錢价人編：《今詩粹》(台北：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刊本)，卷一，頁1。錢价人，字瞻伯，一作瞻百，浙江歸安人。
 - 轉引自羅熾：《方以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31。李世熊此序收入道光年間隨衍室本《數度衍》，清人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八四云：「《數度衍》二十六卷，國朝方中通撰，隨衍室本。首《四庫全書提要》，次目錄，李世熊、揭暄、吳雲三序……。」案，李世熊，字元仲，福建寧化人。

以智的評價大致相當，並非過譽。

崇禎五年(1632)，陳子龍與方以智因論詩相合而定交於西湖，至順治四年(1647)陳子龍投水就義，身處苗地的方以智於次年(1648)作詩弔之，這段以詩學論交為起點的友誼，前後共歷經十七年。這期間，陳子龍與方以智不僅時常以詩文投贈酬答，並曾相互為對方的詩集題序，其中，頗涉及詩學問題的討論。陳、方二子在交往過程中所展開的詩學思辨，不僅閃爍著兩位詩論家的思想光彩，同時也反映了二人不同的生命理想與人格精神，此中意蘊的抉發，對於研究明末清初的詩學演變以及士人心態，皆具有重大的意義，故本文選定此一議題加以論析。

二、詩學定交：論大雅而合

陳子龍和方以智都是以雅人的形象登上晚明的歷史舞臺。例如幾社成員之一的周立勳(1598-1640)在〈岳起堂稿序〉中提到：「今臥子出，而言詩之家，又為一變。縱橫浩達，于學無所不窺；雄深悽惋，干預風代，尤極于古。所撰著樂府以下，諸體備存旨概，多爾雅之文，斌斌有作者之象矣。」[□]夏允彝(1596-1645)〈陳李倡和集序〉則稱道陳子龍、李雯(1607-1647)：「二子生於窮巷，負志當年，跡其導厲之辭，符溫雅之正性，寓飛揚之奮情，可謂不誣矣。」[□]另一方面，初登文壇的方以智也獲得了前輩的大力肯定，例如陳仁錫(1581-1636)序方以智《稽古堂初集》云：「天生才不易，以吾所見，妙年博洽、深通古今者，未之有也。今見皖江方密之，是其人矣。余讀所著作詩、古文辭，已累數百萬言，志在經史，言論古雅，誠廊廟之重

-
- 關於陳子龍與方以智的交往經過，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記載頗詳，但以詩學觀點進行研究的相關著作不多，論述較深者僅見廖肇亨：〈藥地愚者大師之詩學源流及旨要論考〉，《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七期(台北：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2002)，頁260-267；姚蓉：《明末雲間三子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附錄：陳子龍交遊考〉，頁342-347。此一議題尚有相當寬廣的討論空間。
- 明·陳子龍：《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附錄三〉，周立勳〈岳起堂稿序〉，頁751。周立勳，字勒卣，江蘇華亭人。
- 同上註，〈附錄三〉，夏允彝〈陳李倡和集序〉，頁759。夏允彝，字彝仲，江蘇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李雯，字舒章，亦江蘇華亭人。

器乎！」[□]何如龍（1569 - 1641）也曾為方以智此書題序，云：「密之年甫弱冠也，**倜儻雅駿**，負大才，著書好古，志在千秋。」[□]這些評論中，「爾雅之文」、「言論古雅」，是就陳子龍、方以智的詩賦文章而論，指涉的是詩文風格；至於「溫雅之正性」、「倜儻雅駿」，則是就陳子龍、方以智的學養才情而論，指涉的是作家品格。亦即陳、方二子的雅人形象，是同時建立在其人其文的整體表現上。

陳子龍嘗有詩云：「俗士久不遇，雅人天下稀。」[□]知陳子龍本以雅人自居，更欲尋求雅人以相知。崇禎五年（1632）秋天，陳子龍與方以智兩位才華冠絕當代的雅人，因論「大雅」相合而結識於西湖，方以智《膝寓信筆》載：

王申遊西湖，遇陳臥子，與論大雅而合。[□]

即記錄了二人以詩論交的時間與地點，這一年，陳子龍二十五歲，方以智二十二歲。西湖分別後，方以智再赴雲間拜訪陳子龍，故陳子龍曾作〈遇桐城方密之於湖上歸復相訪贈之以詩二首〉，此詩第一首云及「小雨煙波碧可憐，殘荷衰柳各娟娟」[□]，點明了二人初遇於西湖的時節；更重要的則是涉及詩學議題的第二首，詩云：

仙才寂寞兩悠悠，文苑荒涼盡古丘。漢體昔年稱北地，楚風今日滿南州。時多作竟陵體。可成雅樂張瑤海，且剩微辭戲玉樓。頗厭人間枯槁句，裁雲翦月畫三秋。[□]

詩中，陳子龍將自己與方以智說成是荒涼文苑中兩位寂寞的「仙才」，此一比喻非僅自負，同時也凸顯了方以智在陳子龍心目中的份量。對照陳名夏（1601 - 1654）〈方直之詩序〉所述：「龍眠方子密之，年十八，游吳越間，詩名大著。... 雲間陳臥子

□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3冊），〈前編〉，陳仁錫〈稽古堂初集序〉，頁455。陳仁錫，字明卿，江蘇長洲人，天啟二年進士。

□ 同上註，何如龍〈稽古堂初集序〉，頁455。何如龍，字康侯，安徽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

□ 《陳子龍詩集》，卷十一，〈偕諸公集盛氏〉，頁319。

□ 清·方以智：《膝寓信筆》（東京：東洋文庫藏，《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頁8。

□ 《陳子龍詩集》，卷十三，頁415。

□ 同上註。

喜為閎麗之言，倔強齊輩，亦自嘆密之為不可及也。」[□]更可探知，詩文成績本已超越幾社朋輩的陳子龍，直到認識方以智，才算遇到了真正旗鼓相當的對手。是以陳子龍自封並稱許方以智為文苑仙才，並以創作「雅樂」來與方以智共勉。

論詩力主「大雅」，原是雲間幾社諸子的共同意見，正是寫於與方以智相交之年的〈幾社王申合稿凡例〉中，陳子龍云：

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至於齊梁之贍篇，中晚之新構，偶有間出，無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吾知免夫。[□]

此文乃為《幾社王申合稿》而作，故「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以符合「大雅」的主張，並非一人之私見，而是如陳子龍所說的「吾輩所懷」。相較之下，在方以智早年的學詩過程中，雖也曾萌生倡復「大雅」的想法，但這樣的想法仍處於醞釀、試煉的階段，如〈曹根遂先生博望稿序〉所述：「大雅久亡，即束髮事筆硯，敢向悠悠語此哉？」[□]必須待到與陳子龍相遇後，此一觀念才算得到進一步的確定，為陳子龍所作的〈陳臥子詩序〉中，方以智即云：「余束髮時為詩，即與天下言詩者不合。年二十，乃交雲間陳子臥子，志相得也。」[□]由此觀之，陳、方二子的相遇，對方以智來說不只是結交了志同道合的詩友，同時更具有形成詩學信念的重大意義。也因此，當年冬天方以智返回桐城，即將與陳子龍論詩所得的體悟，傳達給故鄉「永社」的詩友們，〈澤園興永社〉一詩云：

... 偶然遊吳越，天下浪奔走。大雅殊寂寥，黃鍾讓瓦缶。雲間許同調，歸來

-
- 清·陳名夏：《石雲居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5冊），卷一，頁112。陳名夏，字百史，江蘇溧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方直之，即方以智弟方其義（1619-1649）。
- 明·杜騏徵等編：《幾社王申合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4冊），陳子龍〈幾社王申合稿凡例〉，頁489。
- 《浮山文集》，〈前編〉，卷五，〈曼寓草中〉，頁541。曹根遂，即曹履吉，安徽當塗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
- 同上註，〈前編〉，卷二，〈稽古堂二集上〉，頁484。

告親友。結社詩永言，絃歌同杵臼。河梁如嚆矢，風騷為敝帚。聊以寫我心，何暇計不朽！□

將雲間許為同調之事，歸來以告親友，益可見陳子龍對於方以智的詩學思想確實曾有所啟迪。而透過方以智的推廣，「大雅」之音更由雲間拓展至龍眠，成為兩地詩人共同推遵的詩歌範式。

然而究竟何謂「大雅」？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其一〉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何景明（1483 - 1521）〈六子詩·李戶部夢陽〉云：「李子振大雅，超駕百世前。」□此可以重振於唐代或明代的「大雅」，與陳子龍、方以智所論相同，都是泛指詩歌作品中的雅正之音，其意義雖與《詩經》中的〈大雅〉有所關聯，但並不與之等同。更精細的說，此處「大雅」一詞是以「雅」字為核心概念，「大」字則是強調此雅正之音所體現的盛世意義。我們回顧〈詩大序〉對於六義之「雅」的經學闡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如此的界定偏重從政治層面論「雅」，但「雅，正也」一語，仍保留了以音調、語言之風格討論「雅」詩的空間。後世詩論家論「雅」字之旨，即有此二種不同的取向，例如題王昌齡《詩格》云：「雅者，正也。言其雅言典切，為之雅也。」□此一說法實就詩歌體格而論；另如題賈島《二南密旨》云：「雅者，正也，謂歌諷刺之言，而

-
-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99冊），卷四三，冊98，頁564。
 -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二，頁87。
 - 明·何景明：《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卷八，頁86。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十三經注疏》本），卷一，頁18。
 - 題唐·王昌齡：《詩格》，收入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上，〈六義〉，頁159。

正君臣之道。法制號令，生民悅之，去其苛政。」[□]此一說法則是就詩歌的政治效用而論。這兩種解釋方式雖然各有偏重，但從〈樂記〉「聲音之道與政通」[□]的觀點來看，二者卻又密不可分，故「雅」詩正可理解為：與時代政治相應的雅正之詩。至若「大雅」一詞，則更限定了此與政相通之詩，必須贊述朝廷大政，觀《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可知自漢代以來，「大雅」之詩即具有歌詠朝廷德政的意涵。後世論者亦頗宗司馬遷之說，再如《二南密旨》所釋：「四方之風，一人之德，民無門以頌，故謂之大雅；諸侯之政，匡救善惡，退而歌之，謂之小雅。」[□]此一說法更顯示了「大雅」之詩可以作為盛世的表徵。

以上對「雅」字意義的詮釋，雖然借用了「詩格」一類的材料，但討論的內容並無悖於陳子龍與方以智的見解。試看陳子龍〈宣城蔡大美古詩序〉云：

予嘗謂：今之論詩者，先辨其形體之雅俗，然後考其性情之貞邪。[□]

又〈文用昭雅似堂詩稿序〉云：

子長有言：「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若文子之詩，庶於二者有合矣。[□]

兩段論述中，陳子龍先以詩歌之形體論「雅」，後則引用《史記》語，從詩歌與政治的交涉關係詮解文德翼[□]（1604 - ?）《雅似堂詩稿》中的「雅」字之命意。亦即在

-
- 題唐·賈島：《二南密旨》，收入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論六義〉，頁373。
- 〈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十三經注疏》本），卷三七，頁663。
-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84），卷一一七，頁3073。
- 《二南密旨》，〈論二雅大小正旨〉，頁374。
-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卷二，頁131。蔡大美，即蔡蓁香，安徽宣城人。
- 同上註，卷二，頁120。
- 文德翼，字用昭，江西德化人，崇禎七年進士。

陳子龍的詩學觀念中，「雅」詩正同時具備詩歌體格的審美意義以及反映時代的社會意義。證諸陳子龍贈方以智詩所云「可成雅樂張瑤海，且剩微辭戲玉樓」，前句所稱之「雅樂」，即指符合雅正之風格規範的詩作，後句又謂此一「雅樂」也應是委婉諷諭的「微辭」，則又道出雅正之詩同時也必須具備政治性的功能。至於方以智方面，則可參看〈縵軒詩序〉所云：

治世之音閎以厚，其辭雅，其指遠。竟陵反之，士夫適其固陋，莫便此耳。□

其說更直接的將治世之音與雅正之辭併為一談，「雅」詩所具有的雙重意義於此尤清晰可見。那麼，在陳子龍、方以智的認知中，何者方為符合「大雅」準則的典範詩作呢？觀方以智所述「河梁為嚆矢，風騷為敝帚」、陳子龍所述「詩必宗趣開元」，大體可知，在風騷傳統的價值標準下，漢代之古詩、盛唐之近體皆在取法的範圍，而漢、唐之詩，正代表了盛世正聲。若以明代來說，則是「漢體昔年稱北地」，即以李夢陽（1472 - 1529）之復古為雅、為盛；反之，則為「楚風今日滿南州」，即以竟陵之固陋為俗、為衰。這樣的論詩傾向，除了顯示陳子龍與方以智早年追求雅音的詩學立場相互一致外，同時也透露了兩位才子均對晚明逐漸衰頹的國勢投注了積極關懷的熱情。

三、陳子龍詩學理想的堅持：立體大雅，歸旨忠愛

「大雅」既指盛世雅音，則奉之為詩學圭臬的詩論家，均不免有恢復前代之詩與前代之治的復古思想，陳子龍亦然。縱觀明代詩歌的發展，前七子振興古學在先，後七子起而繼之，陳子龍所欲推動者，則是第三次的文學復古運動。陳子龍為張溥（1602 - 1641）作〈七錄齋集序〉云：

國家景命累葉，文且三盛：敬皇帝時，李獻吉起北地為盛；肅皇帝時，王元美起吳又盛；今五、六十年矣，有能繼大雅，修微言，紹明古緒，意在斯乎！天

□ 明·方以智：《稽古堂文集》（東京：東洋文庫藏，《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卷二，頁35。案，《浮山文集》卷一〈稽古堂初集〉及卷二、卷三〈稽古堂二集〉俱未收此序。

如勉乎哉！□

陳子龍以復古立場觀之，認為明代詩文有「三盛」：一盛在於前七子引領風騷的弘治時期（敬皇帝），代表人物為李夢陽；二盛在於後七子主盟文壇的嘉靖時期（肅皇帝），代表人物為王世貞（1526 - 1590）；三盛即將發生在陳子龍所處的崇禎時期，但此第三盛仍有待完成。文中，陳子龍推尊張溥為「紹明古緒」的不二人選，並以「天如勉乎哉」表達深切的盼望；然而，身為復社領袖的張溥雖有志於尊經復古，卻不以作詩著稱，其詩歌成就並無法與李夢陽、王世貞並論。真正能繼承前、後七子的復古事業者，反而是陳子龍自己，陳子龍在崇禎十年（1637）所寫的〈與吳恭順國華〉中，就曾將重振「大雅」的使命攬為己任，文云：

國家休德，暢於姬、劉。嘉、隆以前，代有卓爾之彥，嗣是而後，非不斐然，無關大雅矣。子龍不揣，雖在短褐之中，妄思盛業，謂當有寄。□

陳子龍所欲追求的盛業，自然不是詩歌之雅正而已，更關乎國家之休德。此一追復「大雅」的詩學理想，完整的貫徹於陳子龍的生命歷程，始終未曾改變，正是持此理想，陳子龍和方以智結為知己，並在二人交往的過程中，屢以詩學引路人的姿態發言，試圖將方以智後來轉趨悲涼的變詩導之於正。

崇禎六年（1633），即陳、方二子定交的第二年，陳子龍為方以智的第一本詩集《博依集》題序，〈序〉云：

去年秋，余游錢塘，遇桐城方密之，出其詩數百篇，諸體都有，大要歸于極古。其才情超烈，有過濟南，而挾旨則同矣。夫以密之之才，豈蹤濟南？軌其兢兢體裁勿逾古，則有以焉爾，蓋重悲夫儕俗之音而以為救也。□

其說以為，方以智才情之超烈有過於李攀龍（1514 - 1570），卻仍依循著李攀龍復古

□ 明·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收入《陳子龍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卷二五，頁365 - 366。

□ 《安雅堂稿》，卷十七，頁1167。

□ 轉引自羅熾《方以智評傳》，頁282。此序原見方以智《博依集》，陳子龍《安雅堂稿》、《陳忠裕公全集》俱未收。

詩作的體裁而未敢踰越，此中原因實在於「重悲夫儕俗之音而以為救也」；意謂方以智是為了力矯竟陵派的儕俗之音，故而重唱古調。由此看來，陳子龍、方以智此時的詩學思想仍以雅正之音為共同追求的目標。但崇禎七年（1634）以後，因為故鄉桐城接連遭逢民亂，天下時局亦日趨紛擾，感於家國震盪的方以智，不禁蒼涼悲歌，其詩風已發生變化而不復昔日風貌。收錄崇禎七年至十二年春作品的《流寓草》[□]，正呈現了方以智此一時期的心靈世界，也刻劃了其詩作由正入變的軌跡。

即在崇禎七年，科考落第的陳子龍由京師罷歸，因聽聞桐城亂起，故作五言排律〈寄贈密之〉予方以智，詩中除了抒發自己未能一展懷抱的抑鬱外，詩末並云：「蜀山搜寇盜，楚峽上豺狼。白帝天邊固，青巾隴外張。江陵愁竟下，皖口料嚴防。何計干戈戢，長江一葦航。」[□]表達了早日平定寇亂的期望。同年，陳子龍又作〈聞桐城亂久矣，龍友從金陵來，知密之固無恙也，甚喜，又以久不見寄書，寒夜有懷，率爾成詠〉五言長詩，詩中再云：「聞變憂玉石，心曲如朝飢。九月楊子來，首訊君安之？云在金陵市，僦宅將移居。聽言知汝在，驚喜復嗟咨。」[□]對於方以智的關懷之情於此更表露無遺。然而，方以智此一時期詩風的轉向，陳子龍卻期期以為不可，並曾幾度去書規勸。陳子龍的這些書信並未全數保留下來，今僅見崇禎十年所寫的〈答方密之〉中提到：「密之名家盛年，多才負氣，又當世亂，不能為人主建一奇、立一策，故不禁其言之頹激而恢蕩也。」[□]此處所言尚多體諒之詞，並充滿鼓勵之意。但透過方以智著作中的回應，可知陳子龍當時的告誡有其嚴峻的一面，試看以下這些記載：

陳臥子讀余〈七解〉及答舒章詩文，大念之，寄書曰：「君近下筆頹激過當，人無故而如此，不祥。」農父亦深誡余。然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謂何？（《膝寓信筆》）[□]

□ 《流寓草》卷七有〈己卯春池陽飲次尾、德輿、季先，寓中即席分韻，成二十二韻〉，己卯即崇禎十二年，可定為此集收詩之下限。見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0冊），卷七，頁724。

□ 《陳子龍詩集》，卷十六，頁539。

□ 同上註，卷五，頁136。龍友，即楊文驄（1597 - 1645），貴州貴陽人。

□ 《安雅堂稿》，卷十七，頁1172 - 1173。

□ 《膝寓信筆》，頁20。農父，即周岐（1607 - ？），安徽桐城人。

臥子覽余《流寓草》，誠予曰：「悲歌已甚，不祥。」余雖欲更變其變，已不自知其然。（〈熊伯甘南榮集序〉）□

一俯一仰，而不自知其聲之變矣。臥子嘗累書戒我：「悲歌已甚，不祥。」嗟呼！變聲當戒，戒又安免？（〈宋子建秋士集序〉）□

陳子龍寄書相誠之事，方以智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反覆提及：《膝寓信筆》為事發當時的記錄，約記於崇禎十年，〈熊伯甘南榮集序〉為崇禎十六年（1643）所作，〈宋子建秋士集序〉則已是明亡十餘年後的作品；可見方以智對此事始終難以忘懷。而由以上徵引的文句可以獲知幾項訊息：其一，為了扭轉方以智趨於頹激的詩風，陳子龍曾「累書」叮嚀，可謂用心良苦；其二，陳子龍不滿意方以智的悲歌之作，這些作品除《流寓草》外，還包括〈七解〉□以及與李雯的贈答文章；其三，陳子龍書信中提到，方以智詩風的變化是一種「不祥」的徵兆，意指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的觀點視之，此一風格轉向預示了國家將走向衰微，因此必須及時導正；其四，對於陳子龍的告誡，方以智每以「不知其然而然」一類的話語自明心曲，用以解釋自己的詩作從雅音轉入變聲，實是情感的真誠流露，而非人力所能控制。

由前段的討論可知，陳子龍所念茲在茲者，不只是方以智的詩作，更在於與詩人作品緊密相繫的社稷之命運。正因為關切國家未來的前途，當崇禎十一年（1638）陳子龍正式為方以智《流寓草》題序時，已不忍道出「不祥」之語，反而改採積極樂觀的態度論之，其文云：

夫才士失職，不得在鄉里，困頓於羈旅，棲遲於道途，其發為詞章，固無怪其鮮和平之氣者。然又有異此，豈人力哉？建安中，海內兵起，孔璋託身於河朔，仲宣投足以荊楚，其詩哀傷而婉，不離乎雅也，此霸圖之啟也。... 天寶之末，詩莫盛於李、杜，方是時也，棲甫岷峨之顛，放白江湖之上，然李之辭憤而揚，

□ 《浮山文集》，〈前編〉，卷五，〈曼寓草中〉，頁539。熊伯甘，即熊人霖（1603 - 1666），江西進賢人，崇禎十年進士。

□ 同上註，〈後編〉，卷一，頁665。宋子建，即宋存標，江蘇華亭人。

□ 〈七解〉為崇禎十年作，文見上註，〈前編〉，卷三，〈稽古堂二集下〉，頁500 - 505。

杜之辭悲而思，不離乎風也，王業之再造也。... 今觀方子之詩，於憂愁感慨之中，深厚壯拔，自非盛世，此聲何為來哉！□

陳子龍以建安時期陳琳、王粲之詩，以及天寶時期李白、杜甫之詩來比擬方以智的詩作，認為陳琳、王粲詩「哀傷而婉，不離乎雅也」；而李白詩「憤而揚」，杜甫詩「悲而思」，均「不離乎風也」。此一詩風取向，雖不否定哀傷、悲憤之情的合理性，但更加強調建安、天寶詩人能以「人力」克服環境的困頓，長保詩歌的風雅傳統於不墜，故能重新開啟王業霸圖；相同的，方以智《流寓草》之作亦然。文末，陳子龍更明白指出：方以智此部詩集於「憂愁感慨之中」依然「深厚壯拔」，實代表了盛世之音。如此的讚揚與上述陳子龍告誡方以智語，狀似矛盾，實則二處所展現的詩學理想與憂國情操並無不同，同樣都充滿了陳子龍對於重振雅正之音與明朝盛世的主觀期望。

雖然在主觀願望上，陳子龍希望自己和方以智都能持續創作「大雅」之詩，但在客觀情勢上，陳子龍本身的詩作亦不能不受外在環境所影響。崇禎十年，陳子龍及進士第，於觀政刑部時，曾登上嘉靖年間李攀龍、王世貞諸子唱和的白雲樓□，故是年所為詩集名曰《白雲草》。關於此集的音調風格，方以智〈得臥子書，讀其白雲草，感而答之〉一詩曾有所體會：

長書讀罷短歌成，自倚東風變羽聲。青簡數行知我苦，白雲一卷以官名。顧瞻宮闕傷時事，交接公侯說世情。好學貴人誇得意，牢騷何故不能平？□

時流寓南京的方以智在讀完陳子龍的來信與詩作後，發覺陳子龍的詩風同樣非復雅正宮聲，而轉為慷慨激昂的羽聲。方以智因而故作質疑：甫中進士的陳子龍正值自誇得意之時，詩作又為何充滿牢騷不平之氣？其實，詩中「顧瞻宮闕傷時事」一語，已說

□ 《安雅堂稿》，卷三，〈方密之流寓草序〉，頁151-152。此文繫年據《方以智年譜》。又案，《安雅堂稿》中「流寓草」作「留寓草」，據方以智詩集改。

□ 陳子龍〈嘉靖五子詩序〉云：「白雲樓在刑部中，即嘉靖時王、李諸子遊息咏歌之地也。」見《陳子龍詩集》，卷六，頁159。

□ 《方子流寓草》，卷六，頁714。案，奏完一首樂曲曰「成」，此處「短歌成」應指讀畢陳子龍的詩作，而非指方以智自成短歌。

明方以智心中的答案。即使連陳子龍自己，也不否認此部詩集有「寂寥」□之音，不過在〈白雲草自序〉中，陳子龍卻是以更多的篇幅從正面闡釋詩歌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我嘗與李子言之矣：「詩者，非僅以適己，將以施諸遠也。」《詩》三百篇，雖愁喜之言不一，而大約必極於治亂盛衰之際。遠則怨，怨則愛；近則頌，頌則規。怨之與頌，其文異也；愛之與規，其情均也。夫左徒、陳王之作，悽惻而纏綿，推其大旨，又何忠愛之至乎！長卿、子雲，當大漢之隆，宣導盛美，文詞瑋麗，然而〈上林〉則曰：「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仁者不繇也。」〈甘泉〉則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是故怨而不傷，頌而不諛者，君子之事君也。□

在陳子龍看來，詩歌不只是為了「適己」而作，更應重視的是「施諸遠」的功效，如《詩》三百，其中固多愁喜之言，然此愁喜之言大都曾在治亂盛衰之際發揮政治上的作用。後世君子之事君亦然，疏遠則哀怨，怨中應藏忠愛之旨，如屈原、曹植之作；親近則歌頌，頌中仍有規諫之意，如司馬相如〈上林〉、揚雄〈甘泉〉二賦。「怨則愛」，「頌則規」，二者文雖異而情實均。而推究陳子龍此論的用心，當是有意將《白雲草》歸入「怨則愛」一類的作品，以證明此作不僅是適己之作，其中更寄託著君子的事君之道。再者，此「怨而不傷」的詩作風格依然無悖於和平雅正之旨，一如陳子龍論《流寓草》所謂「於憂愁感慨之中，深厚壯拔」，兩部詩集同樣都可以謂之雅詩。

在陳子龍的詩學思想中，詩歌不只是時代的被動反映，詩人更可以主動創作詩歌來改造時代，陳子龍對於雅正詩學的堅持所以較方以智更為穩固，原因就在於執守此「雅音興國」□之論。我們可以繼續追蹤此一詩學思想在陳子龍後期文章中的呈現。

崇禎十三年（1640），江河日下的明朝國勢已更危殆，此時，陳子龍仍勉力出仕，

□ 〈白雲草自序〉：「或曰：『... 今子觀山川都邑之盛，典文禮樂之華，宜有雍容歌頌之業，揄揚聖朝，而胡其寂寥也？』」見《安雅堂稿》，卷三，頁168-169。

□ 同上註，卷三，頁167-168。李子，指李雯。

□ 根據蔡瑜先生的研究，「雅音興國」之說是由初唐儒者王通開其端，到後人建構唐詩史時才算真正形成系統。詳見蔡瑜：〈論「聲音之道與政通」的意涵及其在唐詩學中的演繹過程〉，《唐詩學探索》（台北：里仁書局，1998），頁314-324。

獲選為紹興推官，並於任職期間繼續宣揚「大雅」詩學的觀念，如清人朱彭（1731 - 1803）所云：「浙江明季多學鍾、譚，漸乖于正。自雲間陳臥子先生司李山陰，差知復古。後如西泠十子，皆奉司李之餘緒。」[□]在為「西泠十子」之一的柴紹炳[□]（1616 - 1670）作〈柴虎臣青鳳軒文稿序〉時，陳子龍即曾以「大雅」相期許，文云：

今觀虎臣之文，立體大雅，歸旨忠愛，而又砥躬脩行，攻瑕去類，進乎昭明。環寶在櫝，大賈若虛；貞臣淑女，同其瑋麗。其幹文苑之蠱，抗藝林之宗，為無疑也。[□]

此處以文為論，但與論詩之旨相通，其中「立體大雅，歸旨忠愛」八字，精確的從詩文風格與政治意蘊兩方面概括了「大雅」一詞的內涵。陳子龍期勉並且相信，秉持著「大雅」之文、「貞臣」之行，柴紹炳必能匡正當代文苑的弊病，與藝林宗師相抗衡。而如此堅定的信念，直到遭逢亡國之變，依然屹立不搖。陳子龍於國變之初刊刻文集《安雅堂稿》，即以「雅」字命名，後為申涵光[□]（1619 - 1677）作〈申長公詩稿序〉，亦云：

長公詩宗少陵，於本朝好稱大復，激烈之中仍見和雅。其詞則羽，其音則宮矣。長公雖不能如大復子生孝皇郅隆之朝，而年富志盛，才力輻湊，國恥家仇，一身任之，豈至垂老而見中興如少陵者哉！勗哉！[□]

申涵光為詩本宗法杜甫與何景明，亦屬追求「大雅」的復古一路。陳子龍認為，遭逢國恥家仇的申涵光，所為詩作於激烈中仍不失和雅，其外在文詞固為羽聲，但內在音調仍為宮聲，亦即認定其作品實屬雅正之詩。而藉著肯定申涵光發於亂世的雅音，陳子龍再度展現了堅強的意志，斷言國家之中興已不遠哉！

-
- 清·王昶著，周維德輯校：《蒲褐山房詩話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卷上，「朱彭」條，頁150。案，朱彭，字亦錢，號青湖，浙江錢塘人。
- 柴紹炳，字虎臣，浙江仁和人。「西泠十子」為陸圻、柴紹炳、陳廷會、孫治、張丹、丁澎、吳百朋、沈謙、毛先舒、虞黃昊。
- 《安雅堂稿》，卷四，頁266 - 267。「幹蠱」，語出《周易·蠱卦》。
- 申涵光，字孚孟，一作符孟，直隸永年人。
- 《陳忠裕公全集》，卷二六，頁417。

四、方以智早期詩學的轉向：變變不變，聲無雅俗

與陳子龍終身堅持「大雅」詩學相較，方以智一生的詩學思想則幾經轉折。晚年所作的〈詩堂〉一文中，方以智如是回顧：「愚少取何、李，遇陳臥子而聲合。觸事感激，遇姜如須而盡變，後此卮寓，比于騷之亂曲，候蟲寒蟬，不自覺其悉索矣。老而放筆自作，節宣更何避焉！」[□]方以智將自己的詩學歷程分為三大階段：一為少時宗法七子，與陳子龍力倡「大雅」；二為遇見姜垓[□]（1614 - 1653）之後，詩歌盡入於悉索；三為老而放筆，情感節宣自如。但這只是概而論之，方以智詩學變化的實質內容其實更為複雜[□]。至於本節所要討論的，僅限於方以智與陳子龍交往過程中「大雅」觀念的轉向。

方以智有〈文論〉一文，收於崇禎六年（1633）編成的〈稽古堂初集〉中，此文最能完整的呈現其早期的「大雅」思想，試看其說：

治世之文古以厚，其指遠；亂世之文靡以薄，其義倍。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以昭治世之文，意在斯乎？學士可不勉諸？士自念欲通天人，觀古今，以其餘為詞賦，莫若多誦法古昔。然百家浮稱，未可一揆，要其至德要道，統乎六經，擴而十三經。文辭爾雅，敘事達義，則《左》、《國》、《史》、《漢》，大家畢矣。學者務為省覽，誰差采之，以訂雜注之牴牾，剪章句之蕪穢；祛辭義之回穴，正眾流之乖析。一遠鄙倍，返諸大雅，以繹先王之則，明當世之務，豈不庶幾儒者哉！[□]

此段論述主要是就古文而論，但「以其餘為詞賦」的說法，顯然未將詩歌排除在外。分析此段文句，知方以智所體認的「大雅」，依然包含了文章體格和政治意涵兩個層

□ 清·倪嘉慶、方以智等編：《青原志略》（濟南：齊魯書社，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5冊），卷十三，頁701。

□ 姜垓，字如須，山東萊陽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傳見清·徐枋：《居易堂集》（台北：學生書局，1973），卷十二，〈姜如須傳〉，頁341 - 345；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十八，〈萊陽姜公偕繼室傅孺人合葬墓表〉，頁979 - 981。

□ 關於此點，可參看廖肇亨〈藥地愚者大師之詩學源流及旨要論考〉，見註□，全文。

□ 《浮山文集》，〈前編〉，卷一，〈稽古堂初集〉，頁460。

面。就前者而論，「大雅」之文在義理上必須符合儒家思想的「至德要道」，在言語上必須具備「文辭爾雅，敘事達義」的風格，欲達此目標，則應「誦法古昔」，亦即取法《六經》與秦漢文；就後者而論，古以厚而其指遠的「大雅」之文，也就是治世之文，因此學者除了追法前代聖王之外，更應闡明當代事務，藉由詩文來關懷時政。方以智的論點，一方面充滿復古的論調，一方面又具有淑世的理想，無怪乎與陳子龍一論「大雅」即結為至交。

但如前文所述，崇禎七年（1634）以後，因為故鄉桐城的動亂，方以智的詩作風格已轉趨悲涼。此一詩風的轉向，本是情感自然抒發的結果，而非出於理性的認知判斷，故本無是非可論，但由於慷慨悲歌的創作取向已有違與陳子龍共倡「大雅」的理想，因此，方以智不得不在酬贈的詩文中向陳子龍表明心跡。約作於崇禎八年（1635）的〈吳門遇臥子作兼寄舒章〉[□]一詩中，方以智即曾將自己的才力、際遇與陳子龍作一對照：

夜泊金閶門，逢子問安之？君從秣陵來，訪我不相期。酌酒拔劍舞，作歌其聲悲。見子不悲歌，悲歌悲，當告誰？君負天下才，何事不可為。我獨困蓬蒿，被褐行且遲。從此亂離多，請瞻浮雲馳。[□]

「君負天下才，何事不可為」與「我獨困蓬蒿，被褐行且遲」兩聯，呈顯了陳子龍與方以智不同的生命情境，悲歌與否，又豈人力所能為？此外，同一時期所作的〈陳臥子詩序〉中，方以智將自己與陳子龍的詩作差異對比得更加鮮明，再看其說：

余亦素慷慨欲言天下事，而不敢，但能悲歌。歌臥子詩，抑又自悲其志矣。或曰：「詩以溫柔敦厚為主，近日變風，頹放已甚，毋乃嚙殺！」余曰：「是余之過也，然非無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江南全盛，臥子生長其地，家擁萬卷，負不世之才，左顧右盼，聲聲黃鐘。行且奏樂府於清廟，

□ 《方以智年譜》「崇禎八年」條云：「立秋，在蘇州，飲於朱隗、張澤家。」疑此詩即當年所作。見《方以智年譜》，頁70。

□ 《方子流寓草》，卷二，頁674。

歌辟雍之石鼓，備一代之黼黻，以輓逝波於中和，豈不偉哉！□

此文本為陳子龍詩集而作，故句中「或曰」一段應非陳子龍所論，而當是周岐（農父）等友人對方以智的規勸。故鄉淪為戰場的方以智承認自己的詩作已成嘯殺之變風，但又解釋此乃不得已、不自知而變；相映之下，陳子龍生長的江南仍為全盛之地，故其所為詩依然是中和大雅的黃鐘之音。如此的論述，實根源於《文心雕龍》所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而既然情志的抒發無非自然，因此方以智也在自己與陳子龍的詩風分歧之中，找到了二者共同的歸趨，此即〈陳臥子詩序〉文末所述：「同志既寡，撫時擊節，終歸不欺其志而已。」□

對於後來陳子龍因《流寓草》諸作而提出的諄諄告誡，「不欺其志」之說同樣是最佳的迴護之辭，但此一說法，雖讓方以智暫時找到了詩風變化的理由，卻也預示了陳、方二子詩學思想分趨。至崇禎十三年（1640），時正巡撫湖廣的方以智之父方孔炤（1591 - 1655），在擊賊八戰八捷之後，因湖北香油坪一役不幸失利而被逮繫獄，此一事件更讓方以智的生命陷入淒苦愁絕之中。此年，初及進士第的方以智上疏請代父罪，陳子龍獲知消息，曾作〈贈方密之進士〉慰之，詩云：「孤臣莫上緹縈疏，聖主終明魏尚功。指日湛恩還霽戟，期君再世有形弓。」□意謂方以智不必學緹縈上疏救父，方今天子聖明，指日即能察明方孔炤的討賊之功。但憂心忡忡的方以智並不如此樂觀，〈答陳臥子〉一詩如此回覆：

五年誠我歌太哀，纔脫褐衣當此災。空磨兜韃悔不來，父冤撫床徒徘徊。議郎

□ 《浮山文集》，〈前編〉，卷二，〈稽古堂二集上〉，頁 484。案，《浮山文集·前編》的編排略以時代為次，此文收在崇禎八年所作的〈血書孝經題辭〉（據《方以智年譜》繫年）之前，寫作時間似不晚於此年。又，陳子龍各本詩集俱未錄此序。

□ 南朝梁 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二，〈明詩〉，頁 173。

□ 《浮山文集》，〈前編〉，卷二，〈稽古堂二集上〉，頁 485。

□ 《陳子龍詩集》，卷十五，頁 497。魏尚，漢文帝時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帝下之吏，削其爵，後因馮唐上諫而獲赦。事詳《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耿育今嚶嚶，飢不及餐謝君力。公卿門前貴顏色，泥滑滑兮行不得。□

方以智慨歎，陳子龍近五年來「悲歌不祥」的告誡，竟然不幸應驗。此時，朝中無可諫之官，求援於公卿亦不得其門，面對父冤難申的困境，又教人如何能不悲歌？方以智甚至進一步意識到，除了本身的坎坷遭遇之外，事實上，整個大環境的蕭瑟氛圍也正促使著時代詩風的轉變，再看方以智三子方中履（1637 - 1689）在《通雅·詩說》跋語中記其父之言：

感時觸事，悲歌已甚，臥子謂不祥，豈能免乎？庚辰，白雲庫中見黃石齋先生，亦切謂之，然悲且激！一時倪鴻寶、楊兼山、葉潤山諸先生與先君感結之聲，不期各盡其變，沈痛冷刻，刺人入骨。此時舊士，無不激歌。黃陶菴、劉存宗、戴敬夫一以慷慨出之。所未見者，大抵皆然。其變雅乎？□

方以智指出，雖然陳子龍「悲歌不祥」的告誡言猶在耳，與其父同陷囹圄的黃道周（1585 - 1646）也告以此說，但黃道周已作亦不免「悲且激」；至於倪元璐（1593 - 1644）、楊廷麟（？ - 1646）、葉廷秀（？ - 1651）□與父親方孔炤的憂懷鬱結之詩，更已成「沈痛冷刻，刺人入骨」的變聲；再又當時文士如黃淳耀（1605 - 1645）、劉城（1598 - 1650）、戴重（1601 - 1645）□等人，也同樣出以慷慨之音。處於此一詩歌風氣中，方以智對於自己由雅入變的詩作，已更能坦然接受，也更擴大了與陳子龍之間的詩學差異。

但以「遇姜如須而盡變」一語觀之，方以智詩學思想的全然轉向，仍應待到與姜垓論詩之後。關於結識姜垓的確切時間，方以智詩文中的記載不一，〈祭姜如須文〉

-
- 《龍眠風雅》，卷四三，頁 571。耿育，漢成帝時為議郎，時陳湯坐事徙於安定，耿育上書訴陳湯之冤，書奏，天子還湯。事詳《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 清·方以智：《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方以智全書》本），卷首三，〈詩說〉，頁 64。
 - 黃道周，字幼玄，一作幼平，號石齋，福建彰浦人，天啟二年進士。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楊廷麟，字伯祥，號兼山，江西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葉廷秀，字潤山，山東濮州人，天啟五年進士。
 -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江蘇嘉定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劉城，字伯宗，改字存宗，安徽貴池人。戴重，字敬夫，安徽和州人。

云：「憶如須丁丑遊江左而得余也，猶余壬申遊西湖之得臥子，皆以叶用大雅之聲，合奏撫掌而起。」[□]〈與姜如須論詩〉則云：「壬申即遇雲間龍，己卯又與簣管逢。」[□]丁丑為崇禎十年（1637），己卯則為崇禎十二年（1639），二說頗有出入，參考方以智於崇禎十三年所作〈書姜如須紙〉一詩云：「去年爛醉秦淮酒，今年同握春明手。」[□]推知應以己卯之說為確。但在此時，方以智與姜垓論詩依然「叶用大雅」，其詩學仍未「盡變」，再據《通雅·詩說》所錄，二人相與論詩而觀念盡變的時間當在崇禎十五年（1642），試看此條記載：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子美之論也。橫空盤硬，妥貼排奭；垓崖崩豁，乾坤雷礮：此退之所取也。讀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乃能驅使古今，吞吐始妙。如或未然，又增嗟點。且從王、孟、錢、劉入，而深造及此可耳。才各有限，學必深造，然後自用所長，豈必執一以相訾耶？崇禎壬午夏與姜如須論此而筆之。[□]

文末署「崇禎壬午」，即崇禎十五年，此年，方以智與姜垓論詩於京師。二人先舉杜甫〈戲為六絕句〉[□]為說，指出學者應廣取諸家、厚增識力，以為學詩之門徑；後又引韓愈詩句「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奭」，「垓崖崩豁，乾坤擺雷礮」[□]，用以形容氣勢縱橫、吞吐古今之妙的詩歌境界。如此的論詩取向，認同了詩歌多元風貌的價值，並且突出了激昂雄奇一路的詩風，與執守單一格調的詩學立場呈現了明顯區隔。此一論詩要旨，作為方以智真正擺脫「大雅」思想的標幟，意義尤顯重大，方以智也曾將此轉變以詩歌形式展現在七言歌行〈與姜如須論詩〉中，詩云：

-
- 《浮山文集》，〈後編〉，卷一，頁 658。
 - 《龍眠風雅》，卷四三，冊 98，頁 572。案，姜垓著有《簣管集》，故詩中以「簣管」稱之。
 - 同上註，頁 571。繫年據《方以智年譜》。
 - 《通雅》，卷首三，〈詩說〉，頁 59 - 60。
 - 原詩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台北：里仁書局，1980），卷十一，頁 898 - 902。
 - 分別為〈薦士〉、〈調張籍〉之句，前句用於稱許孟郊，後句用於推崇李、杜。見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卷五，頁 528；卷九，頁 989。

杜陵別裁有〈六絕〉，嗤點多師曾論列。翡翠蘭苕上可看，鯨魚碧海中未掣。龍文虎脊誰能馭，歷塊過都經九折。此謂大家收眾長，風雅正變求真訣。王申即遇雲間龍，己卯又與簫簫逢。騷雅漢魏合陶鑄，協律唐宋窮乃工。逐年蒿目多扼塞，臥子謂我太切直。始信昌黎橫空盤，崩豁雷礪顧不得。□

就詩風而論，「風雅正變」皆在兼容並蓄的眾長之中；就時代而論，「騷雅漢魏唐宋」俱在陶鑄協律之列。由此益可見方以智詩學思想的擴大，也因為此一啟悟，方以智終能超越「臥子謂我太切直」的牽絆，直邁向崩落山崖、震動天地的自由揮灑之境。

再至崇禎十六年（1643），方以智寫作〈熊伯甘南榮集序〉，更以哲理的高度為早年的詩學歷程作一總結，文云：

智嘗問中丞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貞誼孤孽感憤之所作也，于中和也已傷？」曰：「汝信『思無邪』乎？怨即所以興，發即所以止。苟為不然，蔚氣倚之，倚則安能不偏？必且詆媒以愉快鬥勝。琴太促則入慢，鼓太嚴則隱雷，貴中節耳。廷尉公不云乎：『詩，志也；詩，時也。隨時永志，有變變而不變者存。與時消息，感不自欺，知此幾否？』今所謂浮闊者傷于不情，苛癢者傷于纖忮；苟而之俚，掉而之險，祇嚴詞章之雅，未及乎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有知感之所自來者耶？學為之養，節乃能中，不可不自問也。」我聞大司馬公之論致中和也，猶我廷尉公也。家君在長溪，早傳提命，全琴皆音，徽指相叶。敢以聲無雅俗之冒論，挈楹自遣。□

此段文句中，方以智以「感憤之作是否傷於中和」問於父親方孔炤（中丞公），方孔炤則引用方以智祖父方大鎮（廷尉公，1562 - 1631）之論以告之。方大鎮將「詩」界定為「時也，志也」，意謂：詩歌者，順「時」歌詠其「志」。在此一定義之下，順隨時節的不同，詩人所表現的情志必然有別，但方大鎮又以為，只要與時消息之情志感發於不自欺，則詩歌風貌的變化在萬變之中，仍有永恆不變的真實本質，故謂「有

□ 《龍眠風雅》，卷四三，冊 98，頁 572。

□ 《浮山文集》，〈前編〉，卷五，〈曼寓草中〉，頁 539。「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雅·伐木〉之句。

變變而不變者存」。方孔炤依據此論加以發揮，認為情感之或怨或興，或發或止，皆應不隱藏、不矯飾的任其自然流轉，若能忠於心中所感，再以學力養之，則可使所發之志臻及發而皆中節的和平之境。執此標準，方孔炤並對晚明的詩歌流派提出批評：浮闊者指七子一派，此派之失在於「傷于不情」、「祇嚴詞章之雅」，亦即未知「感之所自來」；苛癢者指公安、竟陵，此二派之失在於「傷于纖佻」，或「苟而之俚」，或「掉而之險」，均忽略了「學為之養」的重要性，故諸派實皆未能符於中和之節。若與方以智早年的「不欺其志」之說相較，此具有家學淵源的一番論述，理論更為深刻、嚴密，也因此，在聆聽父親的訓勉後，方以智更能體會詩歌的怨愛、雅俗，其實都只是變動於外的現象，詩人之志才是「變變不變」的根本存在，故終以「聲無雅俗」之論作為自己此一時期詩學思想的總結。

五、詩學思想與人格精神的分趨

陳子龍與方以智論詩定交之後，一生的友誼未曾稍改，但在詩學思想方面，二人的見解卻終歸分途。大體而論，陳子龍所堅持的「大雅」信念，強調的是詩歌的社會功能、集體意義；方以智改轍後的詩學觀念，則偏重在詩歌的抒情功能、個人意義。此一分殊，固然和方以智個人的不幸際遇有關，然而若擴大視角從家國覆亡的時代裂變來看，陳子龍與方以智所面對的大環境其實並無二致。因此，欲探究陳、方二子詩學思想分趨的原因，不能僅從外緣因素來考慮，更應著眼於二人內在的生命情志。

崇禎十六年（1643），陳子龍與同郡李雯、宋徵輿（1618 - 1667）共同編成《皇明詩選》，陳子龍所以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率領李、宋二子編選此書，目的實在宣告一種融入生命脈動的詩學理想，如序文所述：

昭代之詩，較諸前朝，稱為獨盛。作者既多，莫有定論，仁鄙並存，雅鄭無別。近世以來，淺陋靡薄，浸淫於衰亂矣。子龍不敏，悼元音之寂寥，仰先民之忠厚，與同郡李子、宋子，網羅百家，衡量古昔，攘其蕪穢，存其菁英。... 二三子生於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於正經，以維心術。

□ 宋徵輿，字韓文，江蘇華亭人，順治四年進士。

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啟迪其意智耳。□

陳子龍明言自己的志向在於刪述昭代詩作，以追子游、子夏的文學之業；但分別雅鄭、恢復元音的文學志業仍不是最終目標，陳子龍所欲實現的，更在於以雅正詩歌維繫世人心術，以促進「國家景運之隆」。可知，陳子龍的一生抱負在於同時振興明代的詩歌與政治。再對照方以智作於順治五年（1648）的〈又寄爾公書〉所云：

性好為詩歌，悼挽鍾譚，追復騷雅，殊自任也。弱冠慕子長出遊，遊見天下人如是而已，遂益狂放，自行至性而不踰大閑。以為從此以往，以五年畢詞賦之壇坫，以十年建事功于朝，再以十五年窮經論史，考究古今，年五十，則專心學《易》。少所受王虛舟先生河洛象數，當推明之，以終天年，人生足矣。□

方以智同樣也性好詩歌，並且也有志於參與政治，但在其生涯規劃中，不過欲以五年的時間主盟文壇，再以十年的時間建立事功，而非以二者作為畢生職志。方以智一生最大的興趣，實在於學術，故有意投注中年的歲月於窮究經史，至晚年則專研《易》理，以終天年。這樣的生命理想，不以天下國家為最終關懷，而是順應著人生的不同階段，努力實現自我價值，並追求一份生活的自適。據此觀之，陳子龍與方以智詩學中「集體/個人」的意義分趨，在某種程度上，正可視為二人實踐生命理想的結果。

同樣處於明清之際的時代背景，陳子龍與方以智選擇了不同的詩學歸趨與人生道路，二人的選擇，也代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格精神。就陳子龍而論，其對於「大雅」詩學的堅持，透顯出一種「以心抗境」的人格力量。試觀陳子龍為宋徵輿所作〈宋轅文詩稿序〉云：

今我與若偶流逸焉，諧漫輕俊則入於淫，淫則弱；偶振發焉，壯健剛激則入於武，武則厲。求其和平而合於大雅，蓋其難哉！宋子曰：「如子言，則是有正

□ 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編：《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序〉，頁2-5。

□ 《浮山文集》，卷八，〈嶺外稿中〉，頁607。爾公，即張自烈（1597-1673），江西宜春人。王虛舟，即王宣（1565-1654），字化卿，江西金谿人，寓居桐城。

而無變也。」予曰：「不然。和平者，志也；其不能無正變者，時也。」□

陳子龍與宋徵輿論詩時，以一貫的立場宣揚「大雅」之聲，宋徵輿質疑此論將「有正而無變」，陳子龍則解釋，詩人所處之時代固有正變，但就詩人之志而言，卻必須力保和平，有正而無變。曾受教於陳子龍的毛奇齡（1623 - 1716）也在〈蒼崖詩序〉中提到與陳子龍論詩的往事，云：「華亭陳先生司李吾郡，則嘗以二〈雅〉正變之說為之論辨，以為正可為而變不可為。」□此處所謂的「正變」，同樣非就外在的客觀環境而論，而是指詩人的主觀之志。在個人心志與時代環境的對立衝突之中，陳子龍不僅倡發了堅定而厚重的詩學論述，同時也在具體作品中呈現此一人格精神，如國亡後所作〈秋日雜感·其十〉云：

經年憔悴客吳關，江草江花莫破顏。豈惜餘生終蹈海？獨憐無力可移山！八廚舊侶誰奔走，三戶遺民自往還。圯上隆中俱避地，側身懷古一追攀。□

此詩當作於順治二年（1645），詩歌意旨可以參考王昶（1724 - 1806）等人的考證：「案是時湖兵已敗，先生雖身未蹈海，已知力絀移山矣。而平日交游或捐軀故國，或入仕興朝，所與遊者，不過如《續年譜》所述諸人，故有『八廚』、『三戶』二語，『圯上』、『隆中』，則自述其志也。」□雖然孤臣已無力移山，昔日「八廚」舊侶也已散去，但不惜蹈海一死的陳子龍，仍認為「三戶」之楚或能亡秦，仍欲追攀遊於圯上之張良、避居隆中之諸葛，為已然傾倒的國家做最後的努力。此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精神，撼動人心的展現了陳子龍堅毅卓絕的人格典範。

至於方以智的詩學轉變，則呈現「以心順境」的另一種生命情調。如前文所述，與陳子龍共倡「大雅」，不過是方以智的年少理想，其平生夙願實在於讀書論學，尤其是歷經生命的種種磨難後，方以智對政治的熱情已然消退，因而更加留意於著述之

□ 《安雅堂稿》，卷二，頁125。

□ 清·毛奇齡：《西河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國學基本叢書》本），〈序十一〉，頁387。毛奇齡，字大可，浙江蕭山人。

□ 《陳子龍詩集》，卷十五，頁528。案，東漢名士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等八人號稱「八廚」。

□ 同上註，頁529。王昶，字德甫，江蘇青浦人，乾隆十九年進士。

事。順治四年（1647），流離嶺南的方以智養病於新寧夫夷山，此時永曆朝中大臣屢勸方以智出山輔政，方以智作〈夫夷山寄諸朝貴書〉婉拒之，書中一方面說道：「弟監寐原尋死地，但平生讀數行書，欲少畢其著作，然後曝骨原野，此其至願也。」一方面也指出自己：「本文弱書生，而氣奮則欲橫尸戰場，今出則速死耳，殊非年來難後所講老莊之學。」[□]顯然，講老莊之學來安頓身心，暫且迴避一死以求著作的完成，已成為方以智在國變之後最大的心願。同年，方以智於沅州天雷山寫下〈俟命論上〉一文，更清楚表明自己的生命抉擇，文云：

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則名教所惡，聖人峻其防，則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無二。」論其學，則曰：「修身俟之，所以立命。」「生，寄也；死，歸也，不動心而已。」其保身之道，則曰：「既明且哲。」「守死善道，無道則隱。」此與老氏身退，其指一也。……聽其自然，俟之之道也。「君子居易以俟命」，易也，俟也，至人所以不傷其天也，時至則死耳，初非以死博名也。[□]

面對國家的衰亡以及親友的死難，方以智也曾徘徊在生死歧路之間，但在思索前代聖賢關於生死的論述後，方以智決定不以死博名，而願奉行《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及《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諸語作為立身準則。但在方以智的生死思辨中，卻以「聽其自然」解釋俟死之道，並且將居易以俟命的「君子」轉化為不傷其天之「至人」，實質上已將儒學義理道家化。此種詮釋路向，顯示方以智此時的心境已由儒入道，順其自然、時至則死的處世態度，暫時成為了方以智安身立命的方式。

若與前代哲人相比，陳子龍「以心抗境」的精神接近於屈子，方以智「以心順境」的精神則接近於莊子。此一比附，尚有實際例證可說。甲申國變當年，宋徵輿合刊陳子龍、李雯及自己詩作為《雲間三子新詩合稿》，陳子龍曾題〈三子詩選序〉，云：「蘆漪之側，有漁父焉，予將和日月之章，以續此編，不敢遂詠參辰之作也。」[□]陳

□ 《浮山文集》，〈前編〉，卷七，〈嶺外稿上〉，頁 597。

□ 同上註，〈前編〉，卷七，〈嶺外稿上〉，頁 599。

□ 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雲間三子新詩合稿》（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三子詩選序〉，頁 9。

子龍將向澤畔漁父表明心志，願以詩歌追和「日月之章」，此詩章正是屈子足以「與日月爭光」之作。再如方以智顛沛嶺南時曾作〈祭鹿公叔祖文〉，文中自述：「嘗云：『以曠達行其謹介。』今脫略生死，超然得失，真有老莊之風。」[□]此處雖然老莊並舉，但超然於生死得失的境界，顯然是就莊子而說，其中「以曠達行其謹介」一語，即是方以智童年時嚮慕莊子之風的往事[□]。由這些例證可知，陳子龍與方以智在面對亡國的生命情境時，確實曾分別在屈子與莊子的人物形象上，找到了人格精神的認同。

有意效法屈原的陳子龍，果如其言，於順治四年（1647）投水就義，次年，以莊子身姿遊處人間世的方以智，作〈哭陳臥子〉一詩悼之。詩前小序云：「憶與臥子相遇西湖，一歌而合，兩人定交，今遂十七年。天下之風漸變，而天下之亂已極。著書立說，願何由遂？生此何不幸乎！聞臥子死難，得死所矣！然不能不哭也。」詩云：

共指西湖靈隱松，揮毫刻石記相逢。文章自小誇司馬，名字當今比臥龍。一死泰山於汝畢，再生苗地為人傭。悲歌奠酒沅江水，與淚東流到九峰。[□]

方以智的詩序及詩句，都是從與陳子龍論詩定交的往事說起，生命中那一場重要的相遇，可說是方以智通脫性格中重要的貞定力量，值得再三追憶。詩作頷聯，方以智以司馬相如之文才、諸葛孔明之武略讚譽陳子龍，也間接透露二人當年論交的「大雅」詩學，具有詩歌與政治的雙重內涵。頸聯的生死對比，則說明了二人詩學與生命的分趨：「以心抗境」的陳子龍一如屈子，以死亡成就了重於泰山的人格典範；「以心順境」的方以智則追尋日新變化的莊子思想，試圖以著書立說來尋求生命的重生。尾聯

-
- 《浮山文集》，〈前編〉，卷九，〈嶺外稿下〉，頁 634。此文作於順治四年。鹿公，即方龐（？-1647），本名大掄，方以智族叔祖。
- 《象環寤記》中，緇老人曰：「……汝卅時，汝祖督汝小學，汝曰：『曠達行吾曲謹。』吾呼汝彌陀，汝曰：『逍遙是吾樂國。』全以莊子為護身符，吾無如汝何。」見清·方以智：《象環寤記》，附於《東西均》（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57。
- 轉引自《方以智年譜》，頁 149。原詩見《桐城方氏詩輯·方以智密之詩抄·流離草》，《龍眠風雅》卷四三亦錄此詩，惟略去序文。「文章自小誇司馬」一句，《年譜》「誇」字作「憐」，今以《龍眠風雅》為據。

的奠酒沅江，固然是苗地實景的描繪，同時也將陳子龍比擬為「赴沅湘之玄淵」□的屈原，以讚譽陳子龍的峻潔之志。就在方以智深情纏綿的悼亡之作中，陳子龍與方以智十七年間的詩學情誼，也寫下了動人的結局。

六、結 語

陳子龍的詩歌理論與詩作風格對清初詩壇具有重大的影響，其中，最常被論者提及的是雲間派與西泠派之間的關係。除前文述及朱彭所提出「西泠十子皆奉司李之餘緒」的說法外，王昶等人為《陳子龍年譜》作〈附錄〉時，亦嘗徵引《白榆集·小傳》所云：「十子皆出臥子先生之門，國初，西泠派即雲間派也。」□關於此二派的詩學傳承，近年來已有學者進行相關研究□。相形之下，陳子龍與魏畊（1614 - 1662）、錢价人之間「大雅」詩學的連繫，則較少受到注意。魏、錢二子曾編選《今詩粹》一書，書前有錢价人〈凡例〉，云：

自數十年前，作者多學竟陵，字雕句別，以示新異。大樽先生獨宗濟南，力返大雅，風氣丕變，乃有雲間詩體之號。後來詩人，青過於藍，於盛唐諸家，爬羅剔抉，張皇幼眇，遂臻極盛。然要其始，實大樽摧廓之力也。故每體皆以大樽為首，誌風會之所自，非直以其志節行誼冠絕當時而已。□

《今詩粹》依詩歌體裁編排，每體皆以陳子龍之作為首，形式極為特殊。如此的編排，

-
- 〈九章·惜往日〉：「赴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見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卷四，頁150。
 - 明·陳子龍自撰，清·王澐續編：《陳子龍自撰年譜》，附於《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669。《白榆集》為西泠十子之一的毛先舒（1620 - 1688）所著，其書未見傳本，此〈小傳〉當係他人為毛先舒所立傳記。又案，毛先舒，字稚黃，浙江仁和人。
 - 可參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第三章第三節〈西泠派〉，頁28 - 35；霍有明：《清代詩歌發展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上篇，〈西泠詩派的宗尚與創作〉，頁23 - 30；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二章〈情志為本與格調優先：雲間、西泠派對七子派詩學價值系統的重建與調整〉，頁43 - 103。
 - 《今詩粹》，〈凡例〉，頁1 - 2。魏畊，字楚白，浙江慈谿人。

一方面是因為陳子龍「志節行誼冠絕當時」，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表彰陳子龍開闢雅正詩風的功績；但以「大雅」詩學的內涵觀之，這兩項因素又應結合為一。康熙元年（1662），魏畊、錢价人皆因通海案而被捕就義，足見二人對於陳子龍詩歌之學的推尊，確實包含了一份忠義精神的認同，此點，特別值得我們關注。

至於方以智，雖然以「聲無雅俗」之論告別早期的「大雅」思想，但其入清之後的詩學論述，仍未完全放下國家的議題。如為同鄉友人吳德操[□]所作〈鑑在變詩序〉云：

士生世而乃作變詩，殊可嘆也。龍眠之詩，以雅為倡，自予數人者始。……昔子美麻鞋見主，拾遺以傳；次山逃猗玗洞，名播南徼。二子之詩，皆變於唐之本調，後世慕其悲涼，感其切直，未嘗不以為盛唐之音也。今吾子既著變詩，而天下方以中興，采風者安知不以龍眠之變雅當〈六月〉、〈民勞〉乎？[□]

此文作於順治五年（1648），論述中，方以智先將吳德操的變詩喻為唐代杜甫、元結之作，後又擬為〈小雅·六月〉、〈大雅·民勞〉等變雅之詩[□]，這樣的比附，用意皆在說明吳德操所創作的變詩，同樣有助於開啟天下之中興。如此的論調，讓我們想起陳子龍當年為方以智所作的〈方子流寓草序〉，二文同樣都對明朝的振興抱存著一份希望，不同處在於：陳子龍強調詩人之志當有正而無變，方以智則認同了變詩的價值。由此看來，方以智雖以莊子的處世態度作為一時的避世方式，但即使逍遙如莊子，也未必認為當擺脫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君臣之義[□]，方以智亦然。也因此，我們若繼續考察方以智後來以遺民身份所發表的詩學論述，除了捕捉其靈動多變的思想特質

□ 吳德操，字鑑在，安徽桐城人，為方以智舅父吳道凝之堂侄，方以智以表弟稱之。

□ 《浮山文集》，〈前編〉，卷八，〈嶺外稿中〉，頁613。

□ 鄭玄《詩譜·小大雅譜》：「〈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見《毛詩正義》，卷九，頁311。

□ 《莊子·人間世》：「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天地之間。」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華正書局，1991），卷二中，頁155。

外，也不能輕忽國家的觀念在其中具有的重要意義[□]。不過，這已屬於另外一個議題了。

□ 事實上，方以智皈依覺浪道盛禪師後的詩學思想仍寄寓復明之志，參謝明陽：《明遺民的「怨」「群」詩學精神——從覺浪道盛到方以智、錢澄之》（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第三章〈「怨」的詩學精神〉，頁63-114。

The Association and Separation Between Chen Zi-Long and Fang Yi-Zhi's Poetics focusing 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Ya” (雅)

Hsieh, Ming-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Chen Zi-Long (1608-1647) and Fang Yi-Zhi (1611-1671), two impressive literary geniuses of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era, not only crafted the most excellent literary masterpieces of their time but also each left behind a good name to later generations with their lofty moral principles.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Chongzhen Reign (1632), Chen Zi-Long and Fang Yi-Zhi became acquainted through their discussions of the “Da-Ya” (大雅) theory. Thereafter, however, Fang Yi-Zhi's poetic ideas underwent a massive transformation due to the political turbulence of the times. The course of the association and separation based on their poetics, on the one hand, has unfolded their

profound poem study thou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lso reflected their differing personalities, thus quite worth us going into seriously. Employing the concept of “Ya” (雅) as its focal point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is comprised of the following four sections: In the first section, the process of their association through Chen Zi-Long and Fang Yi-Zhi’s discussion on poetics is described,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Ya” (雅). In the second section, Chen Zi-Long’s guidance to Fang Yi-Zhi’s poetic thought is investigated to present Chen’s lifetime ideal in which the concepts of “poetry” and “politics” are combined into one. The third section focuses on how Fang Yi-Zhi reviewed the earlier poetic ideas that emphasize the elegance and purity during his acquaintanceship with Chen Zi-Long and further proposed new ones.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article penetrate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wo masters’ poetics to shed light on the different choices and decisions made through each of their lifetimes.

Keywords: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poetics, Chen Zi-Long, Fang Yi-Zhi, “Ya” (雅)

校對者：作者一校、蘇敏逸二、三校